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与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文库

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系列

主编◎文日焕

# 汉族题材少数民族叙事诗译注

HAN ZU TI CAI SHAO SHU MIN ZU XU SHI SHI YI ZHU

## 达斡尔族 锡伯族 满族卷

吴刚 ◎ 主编

民族出版社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与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文库

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系列


主编◎文日焕

# 汉族题材少数民族叙事诗译注

HANZUTICAISHAOSHUMINZUXUSHISHIYIZHU

## 达斡尔族 锡伯族 满族卷

吴刚 ◎ 主编

 民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族题材少数民族叙事诗译注·达斡尔族、锡伯族、满族卷 / 吴刚主编.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6

(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系列 / 文日焕主编)

ISBN 978-7-105-12791-7

I. ①汉… II. ①吴… III. ①达斡尔族—叙事诗—诗歌研究—中国②锡伯族—叙事诗—诗歌研究—中国③满族—叙事诗—诗歌研究—中国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27747 号

HANZUTICAI SHAOSHUMINZU XUSHISHI YIZHU

DAWOERZU XIBOZU MANZU JUAN

## 汉族题材少数民族叙事诗译注——达斡尔族 锡伯族 满族卷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100013

网 址:<http://www.e56.com.cn>

印 刷: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640 毫米×960 毫米 1/16

字 数:340 千字

印 张:33

定 价:60.00 元

ISBN 978-7-105-12791-7/I·2446(汉 2691)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编辑室电话:010-64228001;发行部电话:010-64224782)

# 总 序

梁庭望

在中华浩瀚的文苑里，有一大批用汉族题材创作的少数民族叙事诗，篇章繁富，如侗族、壮族、苗族、瑶族、白族、仫佬族、布依族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壮族的《唱唐皇》、《何文秀》、《毛洪歌》、《文龙与肖尼》、《蔡伯喈》；侗族的《丁郎龙女》、《李旦凤娇》、《毛红玉音》、《陈世美》、《三国演义》、《封神演义》、《刘知远》、《陈光蕊》；达斡尔族的《三国歌》、《莺莺传》、《水浒》；畲族的《白蛇传》；布依族的《王玉莲》，等等，灿若群星。也有部分长篇说唱类，如白族大本曲《柳荫记》、《白蛇传》、《秦香莲》、《西厢记》；壮族比瑜《二度梅》；满族子弟书《长坂坡》、《杨志卖刀》、《洲西坡》、《青楼遗恨》、《借芭蕉扇》、《胭脂传》、《斩窦娥》、《莺莺看榜》、《孟姜女哭长城》；蒙古族的《薛刚反唐》、《隋唐演义》、《孟姜女》、《宋江》、《武松》、《杜氏娘娘》、《程咬金的故事》、《封神演义》、《两汉演义》、《刘备进荆州》、《北唐演义》、《武松打虎》；侗族嘎锦《梅良玉》等，情节属于叙事诗性质。还有一部分宗教经诗也是叙事诗，如壮族的师公教经典《唱舜儿》、《董永》、《唱三元》、《申公豹》、《鲁班造房》、《唱真武守仙》、《唐王请经》、《唱功曹》及由二十四孝改编而成的二十四部长诗，也具有叙事诗的性质。这些长诗的题材，有的来自汉族的正史和野史，有的来自汉族的民间故事传说，有的来自汉族的民间戏剧，有的来自道教的经典，有的来自汉族的古典小说、公案小说、言情小说。

汉族题材少数民族叙事诗是中华文苑中一丛奇葩，是作为中国

主流文化的汉文化对少数民族辐射的产物，是民族文化交融的硕果，在中华文坛中熠熠生辉。但由于这些长诗长期没有得到定位，“身份”未明，人们不知道作何处置。说它们是汉族文学作品，但其人物、情节、语言、风格又与原作几乎不同，于是乎，一般的中国文学史、中国民间文学史或中国民间文学概论等类著作，大都不予理会，甚至踪迹全无。说它们是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题材却又是汉族的，于是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史或文学简论也极少收录。致使这份珍贵的文学遗产，长期漂流在中国文学史书之外，无法归宿，也极少翻译面世。其实，这份遗产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产物，是中国漫长历史进程中民族文化互相吸收、互相交汇、互相融合的结晶，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欣赏价值，在中华文化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如侗族长诗《孔子之歌》，是迄今发现的歌颂孔子的难得的一部民间长诗，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少数民族是如何从自己生活和审美的角度来认识孔子的。

汉族题材少数民族叙事诗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是中华民族关系的必然产物。活跃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虽然在历史长河中曾经产生过许多地方政权，有过兵戎相见的烽烟，但各民族的向心力使中华一统始终是主流。即使是地方政权，其首领对内为汗为王，但都对中央政权称臣。例如九姓回鹘西迁之前，曾经于8世纪在漠北都斤山一带建立汗国，其首领对内称汗王，但却对唐朝中央政府称臣。磨延啜是鄂尔浑回纥汗国的第二代可汗，公元747—759年在位，758年，唐肃宗封他为“英武威远毗伽可汗”，派堂弟汉中郡王李瑀带着册封诏书和印鉴前去举行隆重的册封仪式。这就是中国政治的特色。通观中国的民族关系，可以用经济纽带、政治纽带、文化纽带、血缘纽带四条纽带来概括，四条纽带把中华各族紧紧联系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这其中，作为主流文化的汉文化对各民族产生了长期的持续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以儒家的思想作为先导的。在儒家思想体系形成之前，三皇五帝时代华夏的影响力就已经到达边陲。神话中皇帝所居的昆仑山，自帕米尔高原东部逶迤向东，从新疆、西藏之间穿过，绕到青海西北，乃是西域各族的腹地。《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教黑熊貔貅豸虎，以与炎帝战于阪

泉之野。”这说明，黄帝麾下以黑熊貔貅豸虎为图腾的北方、西北草原文化带狩猎游牧民族的队伍，“教”字透露了华夏对戎狄的影响。《史记·五帝本纪》还载：“（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可见舜的辖地已经达到五岭。而据《尚书·尧典》，尧时“申命羲叔，宅南交”。疆域已经远逾五岭。《史记·周本纪》载：“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翟荒服。”据《史记·夏本纪》，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为甸服，甸服以外五百里为侯服，侯服以外五百里为宾服，宾服以外五百里为要服，要服以外五百里为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各司其职，统于天子。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sup>①</sup>。到了周代，这种关系更加密切了，为了和边陲各民族沟通，特设译员，负责南方民族通译的官员称象。《周礼·象胥》云：“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其言辞传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礼，节币、帛，辞令而宾相之。”戎是西北各族，狄为北方各族，可见象胥的职责已经是由管理南方的通译扩大成为整个周边各民族的通译了，足见交往之频繁。

春秋战国时代，万国争锋，百家争鸣，对沿边各少数民族的影响自不待言。柳宗元诗《柳州峒氓》中，有“欲投章甫作文身”之句，说的是春秋战国时代今河南小国宋国的商人，将孔子戴过的章甫（一种便帽）贩到岭南去卖，谁知壮族祖先还不大认识孔圣人，他们因为要穿林渡水，故须断发文身，不用章甫，把它丢在一边，引得千年后的柳宗元还愤愤不平。这说明，春秋战国时孔子的影响已经开始到达边陲。在《中庸》里，儒家的思想被提到覆天盖地的高度：“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帔。譬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但儒家的强大影响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三十六郡

<sup>①</sup> 《左传·昭公七年》。

的郡县制结构使中华帝国可以执行“车同轨，书同文”，政令统一，便于中原汉文化的传播。特别是汉代，华夏为汉族所代，根据封建统治的需要，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sup>①</sup>的主张，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思想遂成为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年的支配思想。汉文化以儒家的面目出现，对各民族产生了长期的持续的影响。封建时代，其民族观是以歧视少数民族为特征的，《左传·成公四年》就提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齐国管仲甚至主张“尊王攘夷”。相比之下，儒家就比较仁义。在政治上，儒家主张“仁政”、“德政”；在人际关系上，主张用“仁”、“义”、“礼”、“乐”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形成一整套道德标准。“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sup>②</sup>“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sup>③</sup>故无论是汉族或少数民族，是天子还是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sup>④</sup>，即只要接受儒家的主张，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不予排斥。四海有多种说法，一般指九州或天下四方，其中《尔雅·释地》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这里的四海系指各族居地。历史上封建王朝虽屡用兵，但总的以文治为先，以文治为上，不杀灭一个民族，减少了许多仇怨，这是儒家维系四域的高明之处。汉代以来实行的“羁縻”政策，使许多民族的首领归顺，在汉代就形成了慕汉心理，诚如《白狼王歌》所唱的：“大汉是治，与天合意。”故而“闻风向化”，“慕义向化”，“去俗归德，心归慈母”。这种氛围，有利于各民族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

汉文化的传播，有多种渠道，移民、戍边、贬谪、交贸、战争、问鼎中原、入朝为官、朝贡、府州县学、传教，都是传播的契机。历史上的移民主要有三种：一是朝廷屯垦戍边，其中有中原的士兵、贫民和罪犯，大都拉家带口，举族搬迁。二是被迫，如曾经有汉人

① 《汉书·董仲舒传》。

② 《论语·学而》。

③ 《论语·为政》。

④ 《大学》。

被匈奴、西羌等掳去为奴，“匈奴有奴隶三十万，约占匈奴人口的七分之一或五分之一”<sup>①</sup>。这些奴隶主要是汉族人及一些丁零人。三是中原战乱，汉民被迫逃难到民族地区，如五胡十六国时期，中原烽火连天，汉族难民涌入岭表，至今广西讲汉语方言平话的即其后裔。唐末五代十国及南宋末年，中原再乱，汉族人再次涌入岭南，是为客家人。南明时期，随朱由榔入桂的汉族人，落籍桂北，今操桂柳话的汉族人即其后裔。这些迁入民族地区的汉族百姓，带去了汉族的典籍、民间传说故事和民间戏剧，影响深远。经贸影响亦大，到边陲的汉商自然带去汉文化；到中原经商的少数民族更是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南北朝时，北魏都城洛阳胡商云集，城南永桥附近设有金陵、南然、扶桑、崦嵫四馆，招待四夷胡商及归附者，并有归正、归德、慕化、慕义四里让其定居。《洛阳伽蓝记》载：“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下之区而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乐中国土风，即是受中原汉文化的熏陶。胡商负贩于途，自然也带回去汉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少数民族问鼎中原：一次是十六国时期，汉族人仅建三国，其他十三国均为少数民族上层所建，羯人建后赵，匈奴人建汉、前赵、夏，氐人建成汉、前秦、后凉，羌人建后秦，鲜卑人建前燕、西秦、后燕、西燕、南凉，前后活跃 150 多年；二为宋亡，蒙古族建立元朝；三为满族建立清朝。每次入主中原，都使少数民族本身产生一次迅速的汉化，满族尤甚。不过传播汉文化最有力的当属建立府州县学。田野调查表明，越是汉文教育发达的地方，产生的汉族题材少数民族叙事诗就越多。在岭南，早在汉代就兴起汉文教育。南越国时，丞相吕嘉为越人，其族人七十多人在朝中为官，他们都有较高的汉文化。自公元前 111 年汉武帝灭南越国，“开九郡，设交阯刺史以镇监之……自斯以来，颇徙中国罪人杂居其间，稍使学书，粗知言语，使驿往来，观见礼化。及后锡光为交阯，任延为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为设媒官，始知聘娶；建

---

① 林干：《匈奴史论文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



立学校，导之经义。由此已降，四百余年，颇有似类”<sup>①</sup>。这段话，概括了汉文教育在壮族祖先中传播的过程。唐宋以降，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建立府州县学，推广汉文教育。在西南地区，南诏国重视汉文教育，自建国即采用汉文。《新唐书·南诏传》载：“郑回者，本相州人。天宝中举明经，授嵩州西泸县令。嵩州陷，为所掳。阁罗凤以回有儒学，更名曰蛮利，甚爱重之。命教凤迦异。及异牟寻立，又令教其子寻梦凑。回久为蛮师，凡授学，虽牟寻、梦凑，回得箠挞，故牟寻以下皆严惮之。”所以《蛮书》云：“每有征发，但下文书与村邑理人处，克往来日月而已。”《新唐书·南诏传》也说：“凡调发，下文书聚邑，必占其期。”汉文成为通用官方文字。在北方，蒙古族贵族在中原建立的元朝，出于统治的需要，必须推行汉文教育。元代的教育行政机关是蒙古国子监，负责管理蒙古语文和汉语文两种教育。汉语文教育教授“四书”、“五经”，设“经书国子学”，让诸臣子弟学习汉文化。元代征战频繁，科举时断时续，即便如此也开科 16 次，进士约 1100 多人。壮族地区在唐宋官学勃兴，从唐宋到明清，一共建立了 13 座府学，加上州学和县学，达到 87 所（包括广东连山 1 所，云南文山 2 所），其中桂林府学和柳州府学建于唐代。书院 198 所，社学 232 所，义学 173 所，培养了大批壮族人才。明清时期，贵州的儒学达到 66 所，书院 141 所，社学在明代嘉靖年间就有 54 所，清代又有较大发展，每乡设社学 1 所，清代义学达 301 所。这些官学（府州县学）、书院、社学、义学以及众多私塾，为民族地区培养了一大批掌握汉文的人才。通过他们，汉族的大批史书、论著、小说、戏剧，传播到民族地区的穷乡僻壤。总之，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汉文化，对少数民族产生了强大的辐射。作为封建时代中国主流意识的儒家，虽然代表的是封建阶级的思想，但对中华各族的影响是深层次和全方位的。儒家思想有不少负面的东西，如以忠君为核心的严格的等级观念，打上深深阶级烙印的礼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都是儒家思想的弊端。但由于儒

<sup>①</sup> 《三国志》卷五十三。

家广泛吸纳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其思想中的“民贵君轻”，“仁政”，“德政”；讲求社会秩序；重孝道，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重视教育，“有教无类”；重视学习，提倡“每事问”；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等，都对中华各族的历史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

汉文化对少数民族的影响是持续而深刻的，从经济到政治到文化，全方位辐射，对民族地区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但这种影响是双向的，少数民族的文化也对汉文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如中国南方越人的祖先早在一万多年前就发明了水稻人工栽培法，壮族先民苍梧部留下的炭化稻粒已经有两万年的历史。现在全世界一半以上人口的餐桌上以大米为主食，越人的功劳是很大的。又如汉族的宋词，其母胎是胡乐和中原的清乐，胡乐占了较大的比重。据宋代郭茂倩的《乐府诗集·近代曲辞序》：“唐武德初，因隋旧制，用九部乐。太宗增高昌乐，又造燕乐而去礼毕曲。其著令部者十部：一曰燕乐，二曰清商乐，三曰西凉，四曰天竺，五曰高丽，六曰龟兹，七曰安国，八曰疏勒，九曰高昌，十曰康国。而总谓之‘燕乐’，声辞繁杂，不可胜记。”这十部，便是唐宋词的母胎。其中的西凉、天竺、高丽、龟兹、安国、疏勒、高昌、康国八部为胡乐，只有燕乐和清商乐为中原乐。“（北齐）后主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于是繁习淫声，争新哀怨。”“不能自止。”<sup>①</sup>以至于“王侯将相，歌伎填室，鸿商富贾，舞女成群，竞相夸大，互有争夺”<sup>②</sup>。乐工于是仿胡乐作曲子词，后经过未谙曲调的中原文人仿曲牌填词，遂逐渐脱离曲调而成为一种新的诗体宋词。唐诗宋词是汉文学史上代表性的文学样式，词主要以胡乐为母胎，足见少数民族文学艺术对汉文学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汉族题材少数民族叙事诗的产生是汉文化对少数民族影响的产物，这种影响达到了深层结构，水乳交融。不过，从田野调查来看，汉族题材少数民族叙事诗的作者一般不是少数民族的举人进士，而

①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乐二》。

② （南朝）裴子野：《宋略·乐志》。

是稍谙汉文的少数民族民间艺人。他们谙熟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学和历史文化，有深厚的民族文化情结，其创作出于民族的激情，而他们的名字绝大多数是不知道的，故而汉族题材少数民族叙事诗仍属于民间文学类，具有民间文学的匿名性特征。汉族题材少数民族叙事诗具有以下明显的几个特征：

第一，题材的选择。对题材不是随意吸纳，而是有较强的选择性。在北方的蒙古族、满族、达斡尔族等少数民族中，吸纳的主要是与政治和战争有关的重大历史题材，如蒙古族的《薛刚反唐》、《刘秀走游世界》、《宋江》、《封神演义》、《两汉演义》、《刘备进荆州》；满族的《长坂坡》、《杨志卖刀》、《借芭蕉扇》、《八郎探母》、《一人荣国府》；达斡尔族的《三国歌》等，都是汉文学中的重大历史题材。其次才是从古典小说、言情小说中改编的《三难新郎》、《青楼遗恨》、《胭脂传》、《窦娥冤》、《莺莺看榜》等。北方民族一向活跃于政坛，且屡问鼎中原，他们对政治和战争题材的偏爱是很自然的。岭南和西南的少数民族相反，他们距离中央比较远，很少做人主中原的梦，他们所关注的是民生，故而与北方民族相反，生活尤其是感情生活的题材上升到首位，而政治和战争题材降为次要。少数民族对汉族题材的选择，和各民族的历史轨迹、生活经历、生活环境、民族风情、审美情趣、心理需求有关，他们总是选择那些能够表达自己对政治理想、安宁幸福、生活美满的追求的题材，表达自己的是非和爱憎，寄托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对现实生活复杂现象的理解，对丑恶行径的谴责和厌恶，对勤劳、诚实、善良的褒奖，成了题材选择的准星。有的题材的选择，则明显受儒家传统观念的影响。

第二，体裁的更新。无论是来自汉族的史书、小说、民间故事等散文体还是民间戏剧，到少数民族中都经过掰开、揉碎、重组，形成韵体文学作品。在北方少数民族中，主要是创作了众多的情节生动的长篇说唱；在南方，主要是形成情节曲折的民间叙事诗。在众多民族作品中，清音子弟书比较特殊，它们有三种形式，即“满汉合璧”、“满汉兼”和“汉语”。“满汉合璧”系指同一作品有满文和汉文两种文字，独立成篇，互不影响，各按自己的语言特点押韵。

《孟姜女哭长城》就是这样的作品，其中描绘孟姜女殉夫的悲惨结局，满语版是：Ere gese gunin usacuka arbun muru ai mohon bi, Ai mini tere hesebun gosihon i eigen marikini ya aniya. Bi inemene emhun beye tumen bade eigen be baehanakini, Uthai guwa bade bucehe seme, fayangga oron aicibe inu emgi sasa. 汉语版是：似这样，魂断景况何时了？吁，我那苦命的儿夫何日归？奴不免，一身万里寻夫去，便死他乡，也落得魂魄随。“满汉兼”很有意思，其句子满汉语词共存，互相镶嵌，形成完整的一句，水乳交融。如《螃蟹段儿》中的一句：“那一日，yobo aqe baeta aku de 出门去”，意思是“那一日，戏谑阿哥无事出门去”，整句满汉天衣无缝。“汉语”版产生于后期，也是满汉两种语言的词汇镶嵌融合，但句中满语词全部用汉字记音，如“亚巴衣呢呀拉妈住在哪乡”。“亚巴衣呢呀拉妈”是满语汉字记音，意为“什么地方人”，整句意思是“什么地方人住在哪乡”。<sup>①</sup> 这说明，子弟书在格式上与汉语已经有很大区别。但区别最大的，是用蒙古、达斡尔、壮、侗、白、苗、瑶、布依等民族语言创作的长诗，格式全部是各该民族的语言和诗歌结构。如侗族的《孔子之歌》开头：Weenp weenp xonql kap, Yaoc dos meix al Kongx Sis, Saip xaop wagx xonqh qingk, Eis jiangh sung dingv jinvsungx deic. 汉文意思是：大家安静，我唱孔子之歌，献给众人听，不是废话是典经。其中的“Kongx Sis”（孔子）是借词，但已经进入侗语系统，变成侗语“孔子”。又如壮族叙事诗《唱唐皇》，叙述的是隋朝到唐末三百年的历史沧桑，开头是：“纣有不眉皆麻论，娄唱唐皇斗改闷。居他杨间郭王帝，天下百姓婴利殆。”这是用古壮字创作的壮族七言体排歌，（壮文）读音是：Youq ndwi mbouj miz gaiqmaz lwnh, Laeuz ciengq Danqzvanqz daeuj gaijmwv. Gwqde Yanqzgenh gueg vuengzdaeq, Dienyax beksinqq angq ndi dai. 汉译文意思是：闲着没有什么讲，我们解闷唱唐皇。那时杨坚当皇帝，天下百姓喜洋洋。从语言到诗的格式都完全壮化了。又如壮族叙事诗

<sup>①</sup> 季永海、赵志忠：《满族民间文学概论》，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

《梁山伯与祝英台》开头：“茄庆四年王，号中元甲子。邳广西無字，誼古记英台。照卍由房誼，板心板传扬。古自古那时，寬自卑己位。”读音是：Gyahging seiq nienz vuenɿz, Hauh cungyienz gyapcei-jz. Youq Guengjsei fouz saeh, Gangj gojgeiq Yingdaiz. Ciuq cingzyouz ma gangj, Mbanj ndwij mbanj cienzyienɿz. Goj cix goj naxseiz, Fwen cix bei geijweih. 译意是：嘉庆四年王，号中元甲子。在广西无事，讲英台故事。照情由来讲，村与村传扬。系前时故事，歌在己未年。嘉庆四年（己未年）即公元 1799 年，至今已经二百多年，这样明确长诗的创作时间是不多见的。这部叙事诗采用的是壮族典型的格律诗“勒脚歌”，腰脚韵，复沓规则特殊，每首八行，七、八行复沓一、二行，十一、十二行复沓三、四行，经过反复，形成三节十二行，格式为：

- |     |        |            |            |
|-----|--------|------------|------------|
|     | 嘉庆四年王， | 照情由来讲，     | 系前时故事，     |
|     | 号中元甲子。 | 村与村传扬。     | 歌在己未年。     |
| (1) | 在广西无事， | (2) 嘉庆四年王， | (3) 在广西无事， |
|     | 讲英台故事。 | 号中元甲子。     | 讲英台故事。     |

“勒脚歌”押腰脚韵，即“nienz”押“yienz”，“saeh”押“ŋeiq”，“ganj”押“mbanj”，“seiz”押“bei”。其他民族的类似叙事诗，格式也和壮歌一样从语言到民歌格式都民族化。

第三，主题的切换。不少叙事诗的题材来源于汉族的古典小说、言情小说、公案小说、史书、民间传说故事、民间戏剧，但多数都没有简单地复述原来的主题，而是根据自己的审美情趣进行了切换。例如清代洪昇（1645—1704）的名剧《长生殿》，乃受白居易的《长恨歌》和元人的杂剧《秋雨梧桐》的启发而作，长达五十出，规模宏大。剧中把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故事与安史之乱联系起来，让人看到由于帝王和妃子“逞侈心而穷人欲”，造成了朝政的败坏，给藩镇以叛乱之机，导致了自身的悲剧。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政治争斗，终使天宝之后王朝走向衰落。《长生殿》对李隆基和杨玉环爱情的批判是显而易见的，并借此规劝帝王。满族清音子弟书《鹊桥》（又称《七夕密誓》），虽然取材于《长生殿》，但写的却是“七夕”李隆基和杨玉环在

花间月下密誓：“但愿百年相偕老，决不能于中途弃却芳姿；愿只愿生生世世为夫妇，无负今宵七夕时。”这哪里像是帝王对妃子的偏爱，倒像是一对年青情侣的山盟海誓。很明显，《鹊桥》摈弃了《长生殿》的“垂戒来世”的政治说教，对李隆基和杨玉环采取了赞颂的态度，着眼点在爱情忠贞。又如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揭露的是封建包办婚姻的罪恶，歌颂了纯真自由的爱情，通过一对男女青年在封建制度下未能结合的悲剧，强化了反封建主题。但是，到了壮族的叙事诗《梁山伯与祝英台》里，马家由财主变成了壮族的土司，原来的一般的反封建的主题切换成了反土司的强权政治，与唐末《宣室志》、元杂剧《祝英台》、川剧《柳荫记》都不相同。这种主题的切换，在汉族题材少数民族叙事诗中是很普遍的。它说明，少数民族乃借题发挥，借汉族题材来表达自己的审美理想。

第四，身份的变化。汉族题材民族叙事诗中的主要角色的身份，往往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第一类变化包括人物的民族成分、出生地点、性格特征、言语行为。男女主人公的名字虽然保留，但民族成分、出生地点、性格特征、言语行动、心理特点等都与原作不同，往往是哪个民族的叙事诗，人物就是哪个民族的，出生地点变为在该民族分布区域，性格特征、言语行为、心理特点等也变为那个民族的。壮族抄本《梁山伯与祝英台》，人物名字仍叫做梁山伯与祝英台，但民族成分却变成两个壮族年轻人。两人同路去学堂，祝英台想要吃槟榔，壮族姑娘平时就爱嚼槟榔，清代壮族诗人谢兰诗云：“市声喧响郡城东，贩妇如花倩倚风。多嚼槟榔街上立，迎人一笑牙齿红。”郡城东指今崇左市的旧城，祝英台要吃槟榔，这就明示她是个壮族姑娘。槟榔古代又是壮族的订亲物，《白山司志》载：“土人婚姻……行聘亦以槟榔为重。富厚家以千计，用苏木染之，每八枚包以箬叶，每二三十叶为一束，缚以红绒”，以为聘礼。《岭表纪蛮》也说：壮族青年对歌连情，“约为夫妇，乃倩媒以苏木染槟榔定之”。祝英台问梁山伯要槟榔，就是暗示要梁山伯按壮族婚俗与她私订终身，这告诉人们，梁山伯也是个壮族小伙子。在这里，人物的语言、风俗、心理都壮族化了。第二类是民族成分、籍贯虽然是汉族，但其语言、行为方式、性格特征却是少数民族。白族西山的打歌《读书歌》，梁祝的民族成分虽然没有变，但白

族人民则按西山的特殊生活环境和民族习俗来重新塑造梁祝。在诗里，梁祝是在松树下结拜的。两人同游点苍山，携手盖学堂，造桌椅，上山砍柴，挑水做饭，俨然是一对白族的劳动能手。这和原传说中人物的身份是不同的。十八相送的情节没有了，其取代的情节是下棋和弹琴，方式是问答式的对唱：“哪个一起来下棋？梁山伯和祝英台。/什么做棋盘？青天做棋盘。/什么做棋子？星星做棋子。/棋盘摆面前，山伯不会下。/哪个一起弹琵琶？梁山伯和祝英台。/什么做琵琶？青天做琵琶。/什么做弦线？道路做弦线。/琵琶摆面前，山伯不会弹。”白族人用这样的方式，隐喻山伯不理解祝英台的爱情。<sup>①</sup>第三类是人物的增减。其增加的人物，民族成分一般随主角。人物的变化缘于不同民族表达自己情感的需要，无论其民族成分改变与否，人物的再塑造都是根据民族的审美理想重铸的。在重铸的过程中，注入了民族的灵魂，从而使汉族地区的人物变成活跃于不同民族心灵中的形象，使该民族从中获得感情的冲动和共振，满足自己的审美要求。

第五，情节的改变。情节的改变是最大的改变，原原本本翻译或改编原作的几乎没有。有的是将主要情节打乱重构；有的是改变原来情节的结构，面目全非；有的大的情节没有变更，但细节重雕；有的增加了新的情节。情节的取舍和嬗变服从于塑造人物的需要、表达情感的需要，和某个民族的历史背景、生活际遇、民族风情、心理需求、审美习惯密切相关。南方壮族、侗族、白族等各民族将梁祝故事改编为叙事诗以后，都增加了阎王断案这一情节。祝英台跃入裂开的梁山伯坟，却多不化蝶，二人之魂到阎王那里等待决定命运。同时殒命的马郎也到了阎王那里，状告梁山伯夺爱。最后阎王判决：梁祝前世姻缘，当为夫妇，判二人还阳，白头偕老。这就完成了这些民族对婚姻美满、情侣终成眷属的心理需求。这种团圆的结局，在南方民族当中比较普遍。这反映了距离政治中心比较遥远的南方各族，传统的倚歌择配之俗仍然比较流行，人们对大团圆的结局有较高的期望。缥缈的化蝶虽然很富于诗意，但满足不了人们感情的实际需要。这个情节完全是添加的。云南鹤庆白族的一个梁祝版本，前半的46行诗竟是祝英

<sup>①</sup> 张文勋：《白族文学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

台哭坟，实为一篇祭文。英台哭坟的怨气直冲南天门，弄得玉帝坐卧不宁，只得下旨迁新坟。谁知新坟裂开，英台跃入，坟合。时风雨大作，阎王也被吹得团团转，小鬼吹得眼不睁。风雨过后，“光有花棺不见人”，梁祝二人被吹到山顶，在那里读书习术，终成眷属，实现了大团圆的结局。这个结局的细节，在若干方面都重新安排和刻画，与原作有很大的不同。

清代如莲居士创作的唐宋英雄传奇《薛刚反唐》，被侗族、壮族的民间艺人改编为叙事诗，在侗族中叫《李旦与凤娇》，在壮族中有多种版本，或称《唱唐皇》，或叫《李旦与凤娇》。流传于广西百色市的《唱唐皇》，长五千行，其题材来自《隋书》、《唐书》、《新唐书》、《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薛刚反唐》。长诗从杨坚称帝写起，直到武则天逊位，李旦复位，末尾唱道：“唐朝皇帝二十代，二百八十五年皇。唐朝始末是这样，著书立说后人唱。”时间跨度达314年。长诗以《薛刚反唐》为主，作者显然在突出正统，突出忠臣，谴责奸臣，谴责武则天当政，因而据此做了许多剪裁，情节做了诸多变动。开头部分，很简洁地用杨广弑父抢班夺权和乱伦奸妹两事谴责其荒淫无道，余概省。接下来写李世民征东，仅选择五十五回的《薛仁贵征东》中的三十八回“唐天子驾困越虎城”，浓墨重彩地描绘李世民在被盖苏文追杀的紧要关头，薛仁贵出来救驾，突出功臣的功劳。三十一回也写“唐贞观被困凤凰山”，但救驾的不是薛仁贵，长诗就没有选择。之后是长诗的重点，写的是李旦罹难和崛起的过程，突出了李旦和胡凤娇的爱情和薛刚反武则天，恢复李氏江山的功劳，是根据《薛刚反唐》创编的。《薛刚反唐》一共十卷，一百回，创编者主要从五、六、七、十四卷当中选择和创编，先简洁地描述武则天得宠和陷害李皇后及其亲生儿子李旦的过程。事实上李旦本是武则天所生的第四个儿子，公元684年二月被武则天立为帝，即睿宗，居于别殿，不得参与政事，八月废。710年武氏病重，被朝臣迫去帝号，还政于李唐，李旦复位。712年传位于玄宗李隆基。武则天毒死长子李弘，逼迫次子李贤自杀，三子李显立为中宗，被武氏侄子武三思勾结韦后毒死，但史书上没有武氏追杀李旦的记载。而《薛刚反唐》为了丑化武则天，把李旦说成是高宗的李皇后所生，被武氏追杀而逃难。长诗《唱唐皇》保留了小



说的这个情节，并把它作为全诗的重点，浓墨重彩地加以演绎。其中不少情节舍掉了，留下的又都做了简化和更动。如小说中李旦为了盗得陶家女娲镜，用以破解武则天的火轮牌，冒充李富的儿子去陶家与陶小姐假成亲。长诗为了集中笔墨描绘功臣马周，改为冒充马周的儿子马永。再如武则天最后的下场，小说中的第一百回写她听到李旦和马周、薛刚率军攻入午门，“吃了一惊，不觉跌倒，竟呜呼哀哉”。后被李旦“将武则天尸首扛出斩首”。而长诗中则唱：“到了八月十五晚，兵马就打进京城。捉拿则天来斩首，又杀三思报仇怨。”其实武三思是被中宗之子李重俊杀死的。《唱唐皇》的这些改变，反映了当时壮人中较为普遍的思想观念，即通过突出正统王权，突出功臣良将，反对暴政，反对互相残酷杀戮，反映了人们对政治清平和国家安定的渴求。诗中对武则天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骂她为“母狗则天皇”，说明儒家的正统观念和男尊女卑思想在壮族中有着深刻影响，同时也反映当时壮人对慈禧当政的不满。描绘薛家功绩的三部小说，产生于清代后期，正是慈禧揽政的时代。小说实际是借骂武则天来抨击慈禧的，壮人显然接受了这种观点。小说中说马周率众将杀入午门，午门是故宫正门，又称五凤楼，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清顺治四年（1647年）重建，故杀入午门乃暗示矛头所向为当朝揽权的慈禧。在壮族的另外版本《李旦与凤娇》中，李旦逃难的地方是柳州，凤娇是柳州的壮族姑娘，对他们爱情的忠贞给予热烈的歌颂，这也是壮人为什么选择李旦作为歌颂对象的重要原因，这种对情感的执著是壮人最为珍视的。

汉族题材少数民族叙事诗情节的改变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引进汉族题材拓宽了少数民族的思维空间，使他们的心理需求有了一种新的表达方法。但这种表达必然要适应民族的生存环境、历史机遇、民族习俗和话语方式，而汉族题材毕竟是汉族社会生活的产物，不可能以之原原本本地表达少数民族的需要，必须依照少数民族的理想来取舍、加工、扬弃和变通，情节的变化是必然的。

汉族题材少数民族叙事诗有着多方面的价值，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看，这些作品对研究汉文化传播的条件、时机、途径和方式，乃至研究我国民族关系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其传播过程的变异、增殖、衰减、变形，和引进时的时代背景、民族状况、思想倾向密切相关。一